

21 世纪以来国外亚洲海洋史研究的新进展*

——以英语学界的研究为中心

冯立军

【提要】 海洋史是当前史学研究的一个新分支或新领域,正在引起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和普遍兴趣。相较于国内的海洋史研究,国外学界在研究的起始时间、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上都处于领先地位。尤其近些年,国外学界在亚洲海洋史的研究中成果丰硕,既有以“亚洲的地中海”研究为代表的“总体史”考察,又有以新理论、新方法和新视角为特征的专题史研究。不仅如此,国外学界在这一研究中所呈现出的批判精神和自我反思意识,不但纠正了过往研究中的不足,也推动着这一学科向前发展。

【关键词】 亚洲海洋史 总体史 港口城市

即便在西方学术界,海洋史研究也是一个新近兴起的研究领域。比如,现在称之为“亚洲海洋史”的研究,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还属于“欧洲扩张史”的一部分。1960 年,国际海洋史委员会的成立虽使海洋史成为一个新领域,但其与现在意义上的“海洋史”相比,研究范围仍显得狭窄。^① 不过,随着殖民主义体系的崩塌、亚洲民族国家的独立,使这一研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些学者开始从亚洲的视角研究亚洲海洋,注重运用亚洲民族国家的资料,更多展现亚洲民族本身的海洋活动。^② 可以说,他们的研究强化了亚洲海洋史的深度和广度。到 20 世纪 90 年代,亚洲海洋史的研究逐渐为世界所关注。进入 21 世纪,亚洲海洋史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出现了一大批关于海洋历史文化方面的论著。^③ 总体来说,这些新的研究成果及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总体史”与“亚洲的地中海”研究

“总体史”为法国年鉴学派所提倡,主张研究全面的或整体的历史,亦即在研究历史时,将政治、经济、文化、气候、生态、军事、人口、种族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运用历史比较方法,找出各种社会历史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年鉴学派第二代领袖费尔南·布罗代尔是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其饮誉国际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清时期中国与东南亚海参、燕窝和鱼翅贸易研究”(项目编号:14BZS084)的阶段性成果。

① J. H. 帕里(J. H. Parry)和 C. R. 博克舍(C. R. Boxer)即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他们的著作主要有: C. R. Boxer, *The Dutch Seaborne Empire, 1600-1800*, Penguin Books, 1965; C. R. Boxer, *The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 Hutchinson and Co., 1969; J. H. Parry, *The Age of Reconnaissance*, Weidenfeld and Nicholson, 1963; J. H. Parry, *The Spanish Seaborne Empire*, Alfred Knopf, 1966。

② John E. Wills, Jr., “Maritime Asia, 1500-1800: The Interactive Emergence of European Dominatio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8, No. 1 (Feb., 1993), pp. 83-105。

③ 亚洲海洋史的研究涉及的领域有了较大的拓展,同时亦出现了一些较有影响力的学者,比如:美国的卫思韩(John E. Wills, Jr.),日本的滨下武志(Hamashita, Takeshi),荷兰汉学家包乐史(Leonard Blussé)和法国汉学家苏尔梦(Claudine Salmon)。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编者注:本文标题、目录及文中涉及台湾的“国外”均应为“境外”。

史坛的名著——《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即是这一理论的集大成者。在这部著作中, 布罗代尔所提出的“总体史”与“长时段”理论, 在史学界和社会科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年鉴学派第一代领袖费弗尔亲自撰写了题为《走向另一种历史》的书评, 指出此书“为我们开辟了新的视野”, “具有革命的性质”。^① 亦有人赞扬其为“世界史学中划时代的”杰作。^②

这部著作从法文版问世至今已将近 70 年, 但仍不断再版, 亦被译成英、德、日、意、西、葡、中等十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流传, 其理论也被不少学者所采用。^③ 在亚洲海洋史研究领域, 一些学者将布罗代尔的“地中海研究模式”(即把“地中海”地区当成超越国界范围的地理和文化的统一体进行比较研究) 应用到对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海域研究上(我们姑且将这一研究称为“亚洲的地中海”研究), 且渐成潮流。

早在 20 世纪中期, 荷兰学者范·勒尔以及法国学者乔治·赛岱斯, 包括 80 年代英国学者 O. W. 沃尔特斯都曾强调中国海、暹罗湾以及爪哇海等这些封闭海域的统一性, 主张“把海洋视为促进交流的主要渠道的观点, 与亚洲海洋史的研究相关联”。^④ 到 20 世纪 90 年代, 法国著名汉学家、东南亚及亚洲海洋史研究专家丹尼斯·隆巴德正式提出“东方的地中海”概念。他认为中国南方地区与东南亚恰恰构成一个亚洲的地中海, 因为这个环南中国海地区之间的贸易网络和文化交流与布罗代尔笔下的地中海世界颇为相似。^⑤ 为此, 隆巴德于 1997 年专门组织了一次学术研讨会来探讨“亚洲的地中海”这一概念。^⑥ 隆巴德之后, 德国汉学家普塔克亦致力于“亚洲的地中海”研究, 他甚至认为包括整个南中国海、广东福建海岸、海南岛和台湾这些区域与苏门答腊、暹罗湾以及现在印度尼西亚东部的许多海域和岛屿, 直到帝汶岛、新几内亚、托雷斯海峡甚至澳大利亚海岸一起构成了一个统一的系统。与隆巴德相比, 普塔克更注重海岸与海洋的同等重要性, 尤其强调港口(比如泉州港)在这个统一海域空间的辐射作用。^⑦

进入 21 世纪, 学界对“亚洲的地中海研究”热情有增无减, 已有的研究仍在继续, 新的成果亦不断涌现。^⑧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裔研究中心的李塔娜教授在 2004 年出版的《冰疆: 1750—1880 年滙

① 参见顾良《布罗代尔与年鉴派》,《史学理论研究》1994 年第 1 期。

② 参见张芝联《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史学方法》,《历史研究》1986 年第 2 期。

③ 世界体系理论的倡导者美国的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即深受其影响。对于世界体系理论与布罗代尔“总体史”理论的关系, 沃勒斯坦曾直言不讳地说: “这种研究直接来源于以前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长时段、大范围的社会变化的研究。”参见王正毅《世界体系论与中国》, 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 第 51 页。

④ Harriet Zurndorfer, “Oceans of History, Seas of Change: Recent Revisionist Writing in Western Languages about China and East Asian Maritime History during the Period 1500 – 1630”,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13, 1 (2016), p. 67.

⑤ 参见邓尼斯·隆巴德《东南亚——另一个“地中海”》, 何洁译,《南方华裔研究杂志》第一卷(2007 年), 第 183 页。亦可参见 Sanjay Subrahmanyam, “Writing History ‘Backwards’: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and the Annales) at the Crossroads”, *Studies in History*, 10, 1 (1994), pp. 131 – 145.

⑥ Claude Guillot, Denys Lombard and Roderich Ptak, eds., *From the Mediterranean to the China Sea: Miscellaneous Notes*, Harrassowitz Verlag, 1998.

⑦ Roderich Ptak, “Quanzhou: At the Northern Edge of a Southeast Asian ‘Mediterranean’”, in Angela Schottenhammer, ed., *The Emporium of the World: Maritime Quanzhou, 1000 – 1400*, Brill, 2001, pp. 395 – 428.

⑧ 普塔克对这一研究仍投入较大热情, 主要表现在申请“亚洲地中海”这一主题的研究项目、召开学术会议和出版成果等方面。参见 Roderich Ptak,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Historical Interactions’ (Hong Kong, 19 – 21 July 2001)”, *Archipel*, 62 (2001), pp. 3 – 6; Angela Schottenhammer, ed., *Trade and Transfer across the East Asian ‘Mediterranea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5; Angela Schottenhammer and Roderich Ptak, eds., *The Perception of Spac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ources*, Harrassowitz Verlag, 2006.

公河下游地区的商业与华人》一书中提出“水疆”(Water frontier)概念,认为柬埔寨、湄公河三角洲、暹罗湾、马来半岛沿岸地区以及华南地区由于经济和社会之间呈现出的历史连续性,使它构成了一个类似地中海那样的经济、文化和宗教的有机整体,亦即一个独特的“东方的地中海”。^①显然,这一概念受到布罗代尔和隆巴德的启发和影响,将华南与环南中国海地区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探讨彼此之间贸易网络、移民活动和文化交流的情况。这一新的研究视角“体现了近30年来国际学界最重要的研究趋势之一,因而,李塔娜教授这一成果较为引人注目。”^②

与李塔娜的研究相比,弗朗索瓦·吉普鲁于2011年出版的专著《亚洲的地中海:13—21世纪中国、日本、东南亚商埠与贸易圈》则呈现出更多不同。其一,所划定的“亚洲的地中海”范围更广,包括了日本海、东海、南海、苏禄海、西里伯斯海等不同水域的联结;其二,追求13—21世纪更长时段的研究;其三,更重视对口岸、商贸组织以及商贸网络的考察;其四,以中国作为论述这一统一海域空间相互关系的中心。^③无独有偶,2011年,日本长崎大学杰弗里·冈恩教授亦出版了《历史无界:塑造亚洲世界区域,1000—1800年》一书,运用“亚洲的地中海”这一研究模式来解读1000—1800年的亚洲海洋世界。所不同者,冈恩教授以海上东南亚作为这一结构的中心,而非海洋中国。^④这一研究视角“不仅倡导了将世界历史写入东南亚史学,而且也引入了从东南亚视角来书写以亚洲为中心的世界史”,从而将其本身与“早期的或以领土,或以海洋中国,或以印度为视角的亚洲为中心的历史学家区分开来。”因而,韩国首尔国立大学的郭根维认为,“这本书和安东尼·瑞德的《东南亚的贸易时代》、维克多·李伯曼的《形异神似》以及克雷格·洛卡德的《世界史中的东南亚》一样,助推着东南亚史学的前沿对全球史的影响。”^⑤此外,学界还有将10世纪以后的南海视为“半地中海”、东京湾称为“小地中海”的讨论等。^⑥

可见,以“亚洲的地中海”为研究模式的“总体史”研究,已成为亚洲海洋史研究的主要潮流之一。它之所以为一部分研究者所推崇,是因为这种理论嫁接能够超越传统的“民族、国别”的研究视角,摆脱民族主义史学和殖民主义史学“两极化”研究模式的束缚。正如隆巴德所说,“这些并不是出自一种愚蠢的模仿愿望,而是因为布罗代尔提供了一个世界的眼光”,或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工具,它帮助我们纠正一个传统上的‘中心’,提供了一个更大的空间、更长的时间的统一体”。^⑦

① Nola Cooke and Li Tana, *Water Frontier: Commerce and the Chinese in the Lower Mekong Region, 1750—1880*,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2004.

② 罗焱英《重构水上疆域的历史——〈水上疆域:1750—1880年湄公河下游地区的商业与华人〉评介》,《海洋史研究》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79—283页。

③ Francois Gipouloux, *The Asian Mediterranean: Port Cities and Trading Networks in China, Japan and southeast Asia, 13th—21st century*,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1.

④ Geoffrey C. Gunn, *History Without Borders: The Making of an Asian World Region, 1000—1800*,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⑤ Keng We Koh, “Review of *History Without Borders: The Making of an Asian World Region, 1000—1800* by Geoffrey C. Gunn (review)”,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 24, Issue 3, 2013, pp. 679—681.

⑥ Wang Gungwu, “A Two-Ocean Mediterranean”, in Geoff Wade and Li Tana, eds., *Anthony Reid and the Study of the Southeast Asian Past*,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12, pp. 70—72; Angela Schottenhammer, ed., *The East Asian “Mediterranean”: Maritime Crossroads of Culture, Commerce and Human Migratio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8.

⑦ 邓尼斯·隆巴德《东南亚——另一个“地中海”》,第187页。

二、专题史研究的活跃

在亚洲海洋史的研究中,专题史是较为丰富的。它可以是对传统的航海技术(诸如造船、航海术)、贸易航线、贸易商、贸易港口、贸易网络的考察,也可以是对新的研究领域,如海洋环境、海洋文化等方面的探索。

1. 新研究领域的迅速发展。受全球史的影响,新世纪海洋史的研究视角逐渐由陆地本位转向海洋,许多以往被忽视的话题,得以由边缘渐入主流。其中,以海洋环境史的研究尤为明显。

海洋环境史的目标在于探寻人类社会与海洋自然资源的变化关系。在这个宽泛的主题下包含着两方面的子类别。其一,以物质为导向的海洋环境史。主要是再现过去海洋资源开发模式、过去海洋物种和生态系统的状态以及它们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它强调人类的经济活动,尤其是工具技术等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变化与海洋环境相互作用的关系。摩根和斯台普斯的《东南亚工业海洋渔业史》、托德等人的《污染对东南亚海洋生物的影响》和霍根等撰写的《热带亚洲鲶鱼的长途迁徙和海洋栖息地》都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①

其二,以文化为导向的海洋环境史,主要研究人类如何感知海洋环境,这种认识反过来又是如何影响人类对海洋环境的适应和利用。比如个体渔业对海洋环境的认知、思维及观念;海洋政策、海洋科学及管理;甚至包括海鲜的发展史。对于第一种情况,最典型的即为海洋环境史家研究渔民在海上或是家中自我组织起来的方式,以及他们是如何在各种条件下去感知海洋中的鱼群甚至包括可能会捕获的鱼群的数量。至于第二种情况,学界关注较多,成果亦较为丰富,如西尔韦斯特雷和波利的《亚洲热带沿海渔业管理:主要挑战和机遇的概述》、汉斯·迪特尔·埃弗斯的《治理海洋空间:南中国海作为地中海文化区》,以及由当今国际学术界最著名的荷兰东南亚环境史学家彼得·布姆加德等编辑出版的《浑浊水域:历史和现代视野下东南亚岛屿地区森林和渔业的管理》,等等。^②第三种情况,海鲜的发展史虽未得到应有的关注,但近些年仍有一些可贵的探讨。典型的即是关于与中国市场的巨大消费需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全海参的枯竭问题。由于受中国饮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喜食海参,从现有的资料来看,至少在1000多年以前的宋代,海参的捕捞已经开始。最初的捕捞海域主要在中国的近海,像辽海、登莱海域、浙海以及福建海域,其后又扩至日本海、东南亚海域、澳大利亚北部海岸的海域等。^③一项最近的研究表明,在19世纪海参就已出现过度捕捞的迹象,但因主要在浅海操作,并没有表现出对生态有重大的威胁。不过,随着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海参捕捞的

① 参见 Gary R. Morgan and Derek J. Staples, *The History of Industrial Marine Fisheries in Southeast Asia*, RAP, 2006; Peter A. Todd, Xueyuan Ong, Loke Ming Chou, "Impacts of Pollution on Marine Life in Southeast Asia", *Biodiversity and Conservation*, Vol. 19 (April 2010), pp. 1063 - 1082; Z. Hogan, I. G. Baird, R. Radtk, M. J. Vander Zanden, "Long Distance Migration and Marine Habitation in the Tropical Asian Catfish", *Journal of Fish Biology*, Vol. 71, Issue 3 (September 2007), pp. 818 - 832.

② 参见 G. Silvestre and D. Pauly, "Management of Tropical Coastal Fisheries in Asia: An Overview of Key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G. Silvestre and D. Pauly, eds., *Status and Management of Tropical Coastal Fisheries in Asia*, Madalunyang City: ADB, 1997; Hans-Dieter Evers, *Governing Maritime Space: The South China Sea as a Mediterranean Cultural Area*, SEARC Working Papers Series, No. 152, The Southeast Asia Research Centre, 2014; P. Boomgaard, D. Henley and M. Osseweijer, eds., *Muddied Waters: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on Management of Forests and Fisheries in Island Southeast Asia*, KITLV Press, 2005.

③ 相关研究可参见 H. Sutherland, Trepang and Wangkang, "The China Trade of Eighteenth-Century Makassar c. 1720s - 1840s", in Roger Tol, Kees van Dijk and Greg Acciaioli, eds., *Authority and enterprise among the peoples of South Sulawesi*, KITLV Press, 2000, pp. 73 - 94; C. C. Macknight, *The Voyage to Marege: Macassan Trepangers in Northern Australia*,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1976.

工业化发展,过度捕捞现象极为严重,世界范围内海参的总量随之急剧下降,一些商业价值很高的海参种类在某些海域则被捕捞殆尽。^①类似的还有日本海胆的捕捞和食用。研究表明,由于日本人对食用海胆的青睐,导致海胆的捕捞正一步步远离日本本岛。^②

由此不难发现,海洋环境史研究的一个明显结果,是使史家的视野从以陆地为本位的对人及人类社会的历史考察扩大到了对人与海洋、海洋史与社会的历史相关联的历史叙述模式,从而丰富了历史编撰和叙述的新类型;另一个结果则是,在21世纪之初,海洋环境史仍只是“分散在全世界的几个研究者”为之默默无闻,而到现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对海洋问题的公共意识、资源管理以及学科的学术制度化等方面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2. 传统研究领域的新视角。亚洲海洋史在商人、商品、港口、海盗和商贸网络等传统领域的研究可谓历久弥新,这取决于研究者能够不断地发现新的“研究增长点”,比如研究视角的变化,等等。

(1) 全球比较和互动视角 全球史虽兴起于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但从全球视野或互动视角研究亚洲海洋史也只是近些年的一个现象。在对商人的研究中,范岱克出版于2011年的《广州和澳门商人:18世纪中国贸易的政治策略》一书,认为广州和澳门的中国商家具有极高的商业敏感度,他们逐渐将广州的对外贸易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之中,使广州在18世纪发展成为一个全球化的港口城市。^③在对商品的研究中,乔治·布莱恩·苏萨2014年发表《漫长18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市价记录:全球、亚洲和亚洲区域海洋经济史中的商品和价格》一文,以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漫长18世纪中的市价报告档案为基础,以斯里兰卡的肉桂、东南亚的苏木和中国的明矾为典型案例,探讨这些商品在亚洲内部、亚洲海洋区域以及全球的价格浮动变化情况,深入考察这一时期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发展态势。^④黄英俊(Hoàng Anh Tuấn)2016年发表《另一个过去:全球视野下近代早期越南商品扩张》一文,作者运用全球视野,考察了16世纪末越南丝绸和瓷器工业的发展。该文认为,大量各国流动商人的到来,使得越南的丝绸和瓷器开始大规模对外出口,一个全球性的贸易网络得以建立,从而解释了“越南16、17世纪‘前所未有’的商品经济扩张现象”,也解决了学界“半个世纪无法解决的问题”。^⑤在对港口的研究中,美国加州大学的李国彤2016年发表《全球视野下的地方史:17世纪泉州港的地方精英》一文,认为泉州与全球海外贸易的持续互动,使得穆斯林商人家庭和中国航海者家庭组成了这一时期繁荣的贸易群体。他们的跨区域互动和文化交流极大地冲击了泉州本地的经济和宗教的群体生活,而泉州地方精英则将儒家、伊斯兰教以及道教思想相融合,构成了泉州港“包容并蓄”的生活氛围、贸易环境,使得泉州从一个帝国的边防前哨转变成南中国海一个繁荣的新兴世界经

① Kathleen Schwerdtner Mániz, Sebastian C. A. Ferse, “The History of Makassan Trepaning Fishing and Trade”, *PLoS ONE*, June 29, 2010, pp. 5–6.

② 参见 Mauro Agnoletti, Elisabeth Johann, Simone Neri Serneri, eds., *World Environmental History*, EOLSS Publishers, 2012.

③ Paul A. Van Dyke, *Merchants of Canton and Macao: Politics and Strategie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Trade*,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④ George Bryan Souza, “The VOC’s Price Current Records in the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Commodities and Prices in Global, Intra-Asian and Regional Asian Maritime Economic History”, in George Bryan Souza, *Portuguese, Dutch and Chinese in Maritime Asia, c. 1585–1800: Merchants, Commodities and Commerce*, Ashgate Variorum, 2014.

⑤ Hoàng Anh Tuấn, “Another Past: Early Modern Vietnamese Commodity Expansion in Global Perspective”, in Ooi Keat Gin and Hoàng Anh Tuấn, eds., *Early Modern Southeast Asia, 1350–1800*, Routledge, 2016, pp. 103–121.

济中心。^①

这一时期,一些重要的学术会议也以全球化、全球视野为研讨主题。2002年9月,在日本京都国际日本研究中心召开的国际会议上,与会者提出了“亚洲内部贸易”的概念,认为19世纪末的亚洲,是一个在贸易流通和支付上互利互惠的一体化经济体系,而不是一种各自独立的经济单元。2006年,会务组将部分论文整理出版,题名为《亚洲内部贸易与世界市场》。^②2005年和2007年,康奈尔大学和台湾“中央研究院”亚太区域研究中心分别召开两次学术会议,讨论历史上东南亚的华商、商品与贸易网络等问题。2011年整理出版论文集《华人资本、商品及网络在东南亚的流动》。这本论文集提出了网络和全球互动的概念,从长时段和多维度的视角考察了东南亚华商的经济贸易活动。^③此外,2011年10月,由美国学术团体协会和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赞助的“比较互动视野下的华人文化与社会”国际学术会议在美国亚特兰大的佐治亚埃默里大学召开,在此基础上,2015年编辑出版了《海运、白银和武士:1550—1700年全球史中的海洋东亚》一书,从全球史比较互动的角度对16世纪中期到18世纪东亚海洋区域内的欧洲商业势力(荷兰人、英国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以及亚洲商业势力(中国人、日本人、琉球人和东南亚人)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亚洲人能够运用法律、外交和文化等非军事手段,在与欧洲人的竞争中分庭抗礼,甚至占据优势。^④

(2) 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视角 海盗问题在亚洲海洋世界由来已久,但并未引起广泛关注。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亚洲海域再次成为全球海盗活动频发的高危地带,世界海洋运输、区域政治经济稳定甚至百姓的日常生活都深受其影响。亚洲海盗问题逐渐成为与现实联系紧密、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显学。^⑤

詹姆斯·沃伦的《两个世纪的故事:18和20世纪末东南亚海洋劫掠和海盗的全球化》对18世纪末和20世纪末东南亚海盗活动爆发的历史背景进行了比较分析。该书认为,18世纪末,欧洲殖民主义的扩张、全球贸易的发展,以及中国清政府向西方开放等因素,使得中国对一些东南亚产品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而欧洲殖民者也热衷于购买这些产品。但像伊拉农人(Iranun)、巴拉干几人(Balangingi)等东南亚土著,则是通过劫掠和贩卖人口来争做这种贸易,加之欧洲殖民政府及土著政权无力管制,导致苏禄群岛逐渐成为东南亚海上劫掠的大本营,其活动范围亦随之蔓延到整个东南亚地区。与此相类似,20世纪末,东南亚则在金融风暴之后,金融和经济体系崩溃,政府亦无力管制,于是在东南亚的公海上,海盗活动、跨国犯罪、恐怖主义频发。^⑥约翰·克莱宁和玛农·奥赛韦杰在

① Guotong Li, “Local Histories in Global Perspective: A Local Elite Fellowship in the Port City of Quanzhou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 Vol. 11, No. 3 (2016), pp. 376–399.

② A. J. H. Latham and Heita Kawakatsu, eds., *Intra-Asian Trade and the World Market*, Routledge, 2006.

③ Eric Tagaliacozzo and Wen-Chin Chang, eds., *Chinese Circulations: Capital, Commodities, and Networks in Southeast Asia*,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

④ Tonio Andrade and Xing Hang, eds., *Sea Rovers, Silver, and Samurai: Maritime East Asia in Global History, 1550–1700*,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6.

⑤ 需说明的是,在这一时期对有关亚洲海盗问题的研究,有一些学者做出了一些贡献,比如安乐博(Robert J. Antony)。他的成果有: *Like Froth Floating on the Sea: The World of Pirates and Seafarers in Late Imperial South China*,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3; *Elusive Pirates, Pervasive Smugglers: Violence and Clandestine Trade in the Greater China Seas*, ed. Robert J. Antony, pp. 43–57.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Piracy in early modern China*, *JIAS Newsletter* #36, March, 2005; *Turbulent Waters: Sea Raiding in Early Modern South East Asia*, *The Mariner's Mirror*, 99: 1, pp. 23–38.

⑥ James F. Warren, *A Tale of Two Centuries: The Globalisation of Maritime Raiding and Piracy in Southeast Asia at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ARI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2, Asia Research Institute of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June 2003.

《亚洲的海盗、港口和海岸:历史与现代视角》一书中对古今海盗的定义、海盗的分类以及海盗的行为模式进行对比,认为殖民强权无法从语言上做区分,将海盗与一般的海洋暴力混为一谈,这不利于海盗的治理。^①布鲁斯·艾尔曼等人编辑出版的论文集《海盗与海洋犯罪:历史和现代案例分析》,以历史和现实中的12个案例进行比较分析,认为海盗行径具有深厚的历史和文化的根源,既与经济条件有关,如贫困、工业化、城市化,也与政治条件相连,包括政府的合法性以及维护法律和秩序的能力。作者最后认为,海盗的治理需要“海军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海军,一个国家只有有限的补救或保护手段。”^②此外,阿姆斯特丹大学和荷兰皇家海军学院的格尔·泰特勒撰写了《东南亚海盗:一种历史的比较》一文,通过将东南亚的海盗与荷兰历史上的经历相比较,重点探讨了国家形成过程中海盗及与海盗战斗的国际背景。^③

3. 新研究概念的提出。近些年在对亚洲港口的研究中,学者们的兴趣主要集中在16世纪以来欧洲殖民者曾统治的亚洲港口城市,并将这些港口城市命名为“殖民地港市”(colonial port-city或colonial port-town)。这一新的概念的提出,旨在表明“殖民地港市”与当地政府或土著所控制的非殖民地港市的不同。研究者认为,“殖民地港市”的实际统治者是欧洲殖民者,其居民大多为移民,在18世纪中叶前大部分人口甚至是奴隶。与非殖民地港市相比,这些港市有着完全不同的种族、文化、社会和宗教背景。此观点一经地理学家罗兰·霍瓦特和罗兹·墨菲提出,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学术界引起巨大争议。^④

有的学者认为亚洲“殖民地港市”和“土著港市”并无本质区别。在他们看来,“大多数殖民地港市的研究仅倾向于自我肯定,并没有尝试将殖民地港市与其他类型的港市进行比较,以突出它的所谓独一无二的特征”,而“所谓的特征实际上有些夸大其词”;也有一些研究者,他们并不反对这种分类,只是认为这种观点是有瑕疵的,因为“殖民地港市的概念与可用的历史资料并不相符”,或者说“这个领域的理论与历史现实之间存在着知识缺口。”^⑤

当然,坚定的支持者亦不少。印度学者基德瓦伊提出,“只是因为有些人不同意使用‘殖民地’这个字眼,并不意味着应该抛弃这种观点”,因为“这种类型港市的许多特征在本土环境下的港市并无体现,比如欧洲人在殖民地港市的角色、殖民地港市在整合和互动过程中的角色、殖民地港市与腹地的关系、贸易与商业的角色、港市内大量移民族群的比例构成等等”。除此,“欧洲人在港市内的活动,以及他们在某些重要部门的优势地位,诸如航运、政治机构的控制、国外市场信息的控制和土著经营者资金的控制,亦应受到关注”。^⑥马来西亚国立大学的诺丁·胡欣为弥补上文一些学者提出的“殖民地港市”概念“存在理论与证据知识缺口”的瑕疵,撰写了名为《马六甲海峡贸易与社会:1780—1830年荷属马六

① John Kleinen and Manon Osseweijer, *Pirates, Ports, and Coasts in Asia: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10.

② Bruce A. Elleman, Andrew Forbes and David Rosenberg, eds., *Piracy and Maritime Crime: Historical and Modern Case Studies*, Newport, Naval War College Press, 2010.

③ Ger Teitler, “Piracy in Southeast Asia. A Historical Comparison”, *Maritime Studies*, Vol. 72. No. 1 (2002), pp. 67-83.

④ 参见 Ronald J. Horvath, “In search of a Theory of Urbanization: Notes on the Colonial City”, *East Lakes Geographer*, Vol. 5, (December 1969), pp. 69-82; Rhoads Murphy, “Traditionalism and Colonialism: Changing Urban Roles in Asi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9, No. 1, (Nov., 1969), pp. 67-84.

⑤ Luc Nagtegaal, “The Pre-Modern City in Indonesia and Its Fall From Grace with the Gods”, i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in The Netherlands*, The Netherlands Economic History Archives, Vol. 5, 1993, pp. 39-60.

⑥ Atiya Habeeb Kidwai,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s: Ports, Port Cities and Port-Hinterlands”, in Indu Banga, ed., *Ports and Their Hinterlands in India (1700-1950)*, Manohar Publications, 1992, pp. 31-33.

甲和英属槟榔屿》的专著,尝试考察 1780—1830 年的马六甲和槟榔屿,希望这两个殖民地港市能提供更多的信息,以利于确定这两个港市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学者们提到的理论框架。^① 荷兰乌特勒支大学的杰瑞特·克纳普教授亦发表《1775 年三宝垄,一个殖民地首府和爪哇港市》的文章支持此说。^②

三、批判或反思意识的涌现

国外学界在亚洲海洋史研究方面的学术积累较为深厚,能够敏锐把握学术前沿、引导学术潮流,因而也佳作迭出。这不仅与国外学界学术创新能力有关,也与某些国外学者的批判精神和反思意识相连。

近些年,国外学界致力于对以往亚洲海洋史研究领域具有共识性的成说以及普遍使用的研究方法进行检讨、提出质疑,并由此探索新方法、提出新观点,从而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如上文所述“亚洲的地中海研究”模式,虽已成为亚洲海洋史研究的一股潮流,但相伴而来的质疑声不断。新加坡国立大学王赓武教授由于“中国在东亚区域内的强势地位”以及其“重视陆地轻视海洋”的理念,对“东方地中海概念的统一性存疑”。^③ 与此类似,王国斌以为“中国海域的更加开放,并有中华帝国的存在”致使“出现在地中海的权力与利益之间的连接不太可能出现在中国和它的贸易伙伴之间”,从而怀疑“东方地中海”模式的有效性。^④ 克雷格·洛卡德也因两个“地中海”的很多不同,反对这种类比,他说“与后罗马时代的地中海不同,东方地中海有一个政治和经济强权中国,它与众多更小的国家互动”,而且“中国海和印度洋因为季风的转换造成的‘半年航行’与地中海的全年航行”亦是很大不同。^⑤ 希瑟·萨瑟兰则从东南亚“多国家”、“多种族”的视角,质疑“地中海方法”在亚洲海域的可行性。^⑥ 詹妮弗·盖诺也认为“布罗代尔的地中海模式包含的封闭海域并不适用于更加开放的东南亚水域”。^⑦ 其他如肯尼斯·霍尔、詹姆斯·霍姆斯对“亚洲地中海”的研究模式亦不赞同。^⑧

又如,安东尼·瑞德的《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 年》在东南亚研究和亚洲海洋史研究领域影响深远。詹姆斯·罗奇赞扬其“在印度和中国占据主导、‘东南亚’这一概念缺失的年代里,令人信服的和饶有兴趣地建立起了亚洲另一部分的历史存在”,^⑨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将其评为在东

① Nordin Hussin, *Trade and Society in the Straits of Melaka: Dutch Melaka and English Penang, 1780 - 1830*, NIAS Press, 2006.

② Gerrit Knaap, “Semarang, a Colonial Provincial Capital and Port City in Java, 1775”, in Ulbe Bosma and Anthony Webster, eds., *Commodities, Ports and Asian Maritime Trade Since 1750*,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pp. 79 - 94.

③ Gungwu Wang, “The China Seas: Becoming an Enlarged Mediterranean”, in Angela Schottenhammer, ed., *The East Asian “Mediterranean”: Maritime Crossroads of Culture, Commerce and Human Migratio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8, pp. 15 - 17.

④ R. Bin Wong, “Between Nation and World: Braudelian Regions in Asia”, *Review*, Vol. 26, No. 1 (2003), p. 12.

⑤ Craig A. Lockard, “‘The Sea Common to All’: Maritime Frontiers, Port Cities, and Chinese Traders in the Southeast Asian Age of Commerce, ca. 1400 - 1750”,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 21, No. 2, (2010), pp. 220 - 221.

⑥ Heather Sutherland,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and the Mediterranean Analogy”,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 34, No. 1 (Feb., 2003), pp. 1 - 20.

⑦ Jennifer L. Gaynor, “Maritime Ideologies and Ethnic Anomalies: Sea Space and the Structure of Subalternity in the Southeast Asian Littoral”, in Jerry H. Bentley, Renate Bridenthal, and Kären Wigen, eds., *Seascapes: Maritime Histories, Littoral Cultures, and Transoceanic Exchanges*,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7, pp. 53 - 68.

⑧ Kenneth R. Hall, “Revisionist Study of Cross-Cultural Commercial Competition on the Vietnam Coastline in the Fourteenth and Fifteenth Centuries and Its Wider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 24, No. 1 (2013), p. 104; James R. Holmes, “Strategic Features of the South China Sea”,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 67, No. 2 (2014), p. 30.

⑨ James Roach, “Review of Anthony Reid’s *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1450 - 1680. Volume 1: The Lands Below the Winds*”,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70, Issue 3 (Sep. 1989), p. 789.

南亚的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十佳著作之一(位列第二位)。对此,亚洲海洋史学界在充分领略这一杰出学术成果的同时,仍对其提出质疑,力求突破陈说,不膜拜权威。芭芭拉·沃森·安达娅、维克多·李伯曼、希瑟·萨瑟兰和韦杰夫都提出了自己对瑞德著作的质疑。首先,在1450—1680年东南亚的“贸易时代”历史时期的划分上,他们认为,瑞德的构想太过狭隘,因为经过17世纪中期短暂的经济低迷之后,从16世纪90年代到19世纪,贸易持续增长,并未结束于17世纪中期。^①韦杰夫亦认为,从公元900—1300年,在中国、南亚、中东和东南亚地区即已出现瑞德所说东南亚“贸易时代”的特征,并将之定义为“东南亚贸易时代早期”,对瑞德的“贸易时代”所描绘的各类所谓“新”特征提出质疑。^②其次,对于瑞德将马来—印度尼西亚群岛作为整个东南亚历史的模板,从而提出广泛的东南亚“贸易时代”的概念,李伯曼并不认同,因为瑞德所提到的“贸易衰落、城市化进程下降以及领土分裂”的群岛特征并不适用于同一时期的东南亚大陆。最后,在李伯曼和安达娅看来,瑞德过分重视国际贸易的重要性,强调城市而不是农业社会。^③事实上,一些东南亚社会的繁荣来自农业而不是贸易。^④面对众多质疑之声,瑞德撰写了《1760—1840年东南亚贸易扩张新阶段》一文,或许即是对《贸易时代》的部分反思和修正。^⑤

再如,有关中国明清政府海洋政策的研究,早期的大多数学者认为,在19世纪中期以前,明清政府忽视海洋、基本上不关心其控制力较弱的海岸地区,对海洋及海外世界采取的是消极的、不作为的政策。不过,这一观点在近些年遭到越来越多的挑战。韦杰夫、宋汉理、布琮任和赵刚等人运用中国、日本、韩国、越南以及西方的档案资料,得出与上述研究不同的结论。韦杰夫认为,15世纪的明朝统治者通过官方的朝贡贸易、民间的海禁政策、用兵安南、郑和远洋航海等一系列措施,使得东亚海洋世界尤其是东南亚区域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在明朝政府支持下并与明朝保持亲密关系的马六甲王国的崛起、明朝政府对满者伯夷王朝的削弱、明朝政府对东南亚经济贸易的渗透和控制,以及中华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等等。上述情况表明,“15世纪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程度确实有所扩大,所以也可以认为,15世纪是东南亚海洋中国化的第一波浪潮”。^⑥宋汉理在其研究中也指出,“传统的东亚和西方史学界对晚明政府忽视海洋军事领域有些夸大其词”,因为“在15世纪远洋航海之后的很长时间内,明朝政府保持着大量的战船用以抗击海盗和执行海岸防御任务。换言之,海洋安全仍是晚明政府的首要任务”。^⑦对于清王朝的海洋政策,布琮任认为,在18世纪,清政府从以国家为中心的

- ① Barbara W. Andaya, “The Unity of Southeast Asia: Historical Approaches and Questions”,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 28, No. 1 (1997), pp. 161–171; Victor Lieberman, *Strange Parallels: Integration of the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in Global Context, c. 800–183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5–21; Victor Lieberman, “An Age of Commerce in Southeast Asia? Problems of Regional Coherenc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4, No. 3 (1995), pp. 796–807; Heather Sutherland, “Contingent Devices”, in Paul Kratoska et al., eds., *Locating Southeast Asia: Geographies of Knowledge and Politics of Spac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22–29.
- ② Geoff Wade, “An Early Age of Commerce in Southeast Asia, 900–1300 CE”,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 40, No. 2 (2009), pp. 221–265.
- ③ Victor Lieberman, *Strange Parallels: Integration of the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in Global Context, c. 800–1830*, pp. 15–21.
- ④ Barbara W. Andaya, “Political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Six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in Nicholas Tarling,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Vol. 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402–455.
- ⑤ Anthony Reid, “A New Phase of Commercial Expansion in Southeast Asia, 1760–1840”, in Anthony Reid, ed., *The Last Stand of Asian Autonomies: Responses to Modernity in the Diverse States of Southeast Asia and Korea, 1750–1900*, St. Martin’s Press, 1997, pp. 57–80.
- ⑥ Geoff Wade, “Ming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in the 15th Century: A Reappraisal”, *Asia Research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28, Asia Research Institut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004.
- ⑦ Harriet Zurndorfer, “Oceans of History, Seas of Change: Recent Revisionist Writing in Western Languages about China and East Asian Maritime History during the Period 1500–1630”,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13, No. 1 (2016), p. 79.

视角,对海洋的概念有内海和外海之分。内海是国家权力所达的最远区域,是合法的可持续治理和国家所属的海洋区域,外海则是变幻莫测的海洋区域,不受国家行政管理,亦无法进行经济开采。从 1683 年康熙皇帝统一台湾到 1795 年乾隆皇帝退位,清朝国力强大,拥有足够的海上力量对内海实行有效治理和管辖,只是到嘉庆皇帝时,由于清政府深受内忧外患之扰,国库空虚,财力有限,无法持续维持足够的海上力量,才失去了对内海实施有效保护的能力。^①赵刚则提出,由于早期全球化对经济、宗教、政治和军事问题的影响,清朝初年(1684—1757 年)的几位皇帝——康熙、雍正和乾隆最终采取开放海外贸易的政策,因而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是积极的、开放的和宽容的,中国的对外贸易也是繁荣的。^②

总之,国外的亚洲海洋史研究丰富多彩,成果丰硕。既有以“亚洲的地中海”研究为代表的“总体史”考察,又有以新理论、新方法和新视角为特征的专题史研究。此外,国外学者在这一研究中所呈现出的批判精神和自我反思及修正意识,不仅纠正了过往研究中的不足之处,也推动着这一学科良性发展。与之相比,中国的海洋史研究从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开始,逐渐由此前研究内容相对狭窄的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向研究视野更为开阔的海洋史研究转变。在研究的内容上,不仅注重海岸区域史的研究,而且在海洋文化、海洋管理、政策及对外关系、海洋灾害史与环境保护、领海权等问题上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本文希望借助对英语世界海洋史研究的梳理,使国内学界的研究能从中有所获益,进而推动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

(作者冯立军,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副教授;邮编:361005)

(责任编辑:张旭鹏)

(责任校对:张文涛)

① Chung-yam Po, *Conceptualizing the Blue Frontier: The Great Qing and the Maritime World in the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Doctoral Thesis, Heidelberg University, 2013.

② Gang Zhao, *The Qing Opening to the Ocean: Chinese Maritime Policies, 1684 - 1757*,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3.

From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o Methods of History: The Methodological Turn in John Lewis Gaddis' s Study of Cold War History // Qu Sheng

John L. Gaddis' study of Cold War history underwent a shift in methodology from his early adop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to his later embracement of historical methods. Prior to the 1990s, Gaddis promoted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in the study of Cold War history. In apply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to diplomatic history studies, he analyzed the U. S. government' s Containment Policy and theoretically reexamined the process of the Cold War. He thus proposed the "Long Peace" thesis as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Cold War history. However, growing out of the realpolitik think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Gaddis' s analysis of the Cold War was a bit over-simplified, and the sudden end of the Cold War further exposes the limits of his approach. As a result, after the Cold War, Gaddis turns to historical methods, especially the ones in new cultural history. The shift of the theoretical focus in Gaddis' s research about Cold War history, to some extent, has a possible negative impact on the diversification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the field of American diplomatic history.

New Development in the Study of Asian Maritime History in the Twentieth-First Century: English-Language Scholarship as a Focus // Feng Lijun

Maritime history is one of the new branches in historical studies. There has been a rising interest in its studies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China. In comparison with its state inside China, foreign research on the topic has developed earlier and covered a greater scale both in scope and depth. In recent years, foreign scholarship has produced fruitful outcome, including not only macroscopic studies such as the "Asia' s Mediterranean" thesis but also focused case studies based on new theories, new methods, and new approaches. Particularly maritime historians abroad have demonstrated critical and self-reflective attitudes in revising their own works, which further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ield.

Recent American Scholarship on Herbert Hoover Studies // Zha Quan

Herbert Hoover is one of the most controversial figures in American history. The study of Herbert Hoover in American scholarship has undergone four periods: from the 1930s to the 1950s, the Liberals and the Conservatives debated about Hoover' s policies and ideas; from the 1950s and to the mid-1960s, the New Leftists and Neo-Conservatives revised his image; with the Hoover archives becoming available, between the mid-1960s and the end of the 1970s was a booming moment for Hoover studies; After the 1980s, with the rise of the Neoliber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scholars have begun to rethink the era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dominance before Franklin Roosevelt and thus the role of Herbert Hoover in history.

Medicine, Law and Culture: A History of Scholarship on the Study of Madness in Traditional China // Mao Wei

Over the course of the past hundred years, the study of madness in traditional China, as a collective effort of several generations of scholars, has made dramatic progress. In the field of medical history scholars have reached a consensus that the traditional view of madness in China was based on the unity between mind and body. In cultural history, scholars have explored the important role of the frenzy of the *shi* (educated elites) in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divergent views of madnes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in legal history, scholars have noted that when it came to the sentencing of mad criminals, judges put the level of offence into consideration and sometimes granted leniency, under which minor crimes were exempted and necessary punishment for serious crimes were executed through the procedural control.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such as lack of long-term study and insufficient exchange between different disciplines. At the same time,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madness in China needs to engage a conversation with foreign colleagues based on China' s reality and get beyond the limits of Foucauldian theories.